

战争与文明：欧洲“大转型”之争的历史社会学反思^{*}

王庆明 孙美玲

提 要：波兰尼认为19世纪欧洲的大转型时代是“百年和平”的，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市场—社会”的双向运动。哈尔珀琳批评波兰尼忽略了阶级视角，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19世纪战乱不断，其发展源自“对内剥削—对外扩张”的二元主义。本文从历史社会学视角探查发现：对战争概念界定的不同导致了哈尔珀琳和波兰尼不同的战争叙事；二人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分析视角导致了他们对工业文明内在动力的认识差异。波兰尼并未忽略阶级，他反对绝对的经济决定论，秉持文化阶级论。虽没提出大转型的具体条件和机制，但他对市场体系内在矛盾的分析有穿透历史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战争与文明 大转型 波兰尼 哈尔珀琳 历史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璀璨文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土崩瓦解。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以奥匈帝国军官的身份参加了一战，他切身体悟到战争的残酷和帝国的衰落。在战后废墟上，他尝试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经济起源，他的思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炮火而变得具有了历史延伸性。在追问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机制时，波兰尼（2007：5）发现了西方历史文明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 本文是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B21BZ0340；主持人：王庆明）、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AS2008；主持人：王庆明）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南开大学“历史、经济与社会”读书小组多位学友的批评指正，张震、周子玥、张健和程达针对文章的框架提供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郭林涵、张博琳和张永林的讨论对文章亦有帮助，另外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的重要建议，对于以上师友一并谢忱，文责自负。

即 1815—1914 年间欧洲的百年和平。透过“百年和平之谜”以及这百年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来揭示战争的根源并重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波兰尼对历史社会学的重要贡献(布洛克、萨默斯,2007:56)。然而,波兰尼的重要批评者桑德拉·哈尔珀琳(Sandra Halperin)(2009:54)却指出,19 世纪欧洲历史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百年和平”。在整个 19 世纪,欧洲发生了近 400 场规模不等的战争、暴动、叛乱、革命、罢工等。不单欧洲大国之间战争频发,许多殖民地也发生了大量的暴力起义和局部战争。由此,一个首要的问题是:针对“19 世纪欧洲”这同一时空下的历史场域,为什么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叙事?

战争与和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战争往往是由财富掠夺、领土争端、民族区隔、宗教信仰差异等诱发的集体性暴力冲突;另一方面,战争有时又是达致长久和平的重要基础。哈尔珀琳与波兰尼不同的战争叙事背后,潜藏的是他们关于 19 世纪欧洲文明发展内在动力源泉的认识分歧。波兰尼(2007:114)认为 19 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出现百年和平,除了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由主义国家制和自我调节性市场制这四种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自由市场扩张与社会自我保护相互作用形成的“双向运动”,它构成了欧洲文明的内在特征以及大转型的动力源泉。然而,在哈尔珀琳(2009:93)看来,19 世纪欧洲工业扩张的动力源自对内剥削与对外扩张的“二元主义”:对内剥削劳工,使其长期处于碎片化与贫困化的状态;对外实行帝国主义,通过出口资本和货物来发展外向型的需求和消费。与这种认识论分歧相关联的是,当时的欧洲充斥着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这些不同的思潮不单体现出知识传统上的差异,也呈现为制度设置和政治实践上的差别。由此引出的另一组重要问题是:19 世纪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为何?19 世纪欧洲文明之大转型的真实意涵为何?关于 19 世纪欧洲社会转型历史的重新思考,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秩序能提供哪些现实启迪呢?

以上述问题为指引,我们尝试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理解 19 世纪欧洲战争与文明的新思路。作为历史社会学家的波兰尼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被援引和关照:一是,他将社会视为统一体的整体性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比较历史分析法;二是,波兰尼揭示的 19 世纪欧洲转型的历史轨迹对当下全球发展中国家转型进程的参照意义;三是,波兰尼对欧洲大规模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时使用的双重运动、嵌入性等概念工具和知识范畴。这三个方面也构成本研究重访波兰尼“大

转型”的重要线索。为了避免陷入既往研究的窠臼，笔者尝试将这些线索暗含于对“哈尔珀琳—波兰尼论战”的思想解剖之中。本研究聚焦“和平之争”和“动力之争”这两个核心议题，在反思哈尔珀琳再探大转型的基础上重访波兰尼。本文在篇章结构上作如下安排：首先从历史事实出发，检视波兰尼界定的19世纪（1815—1914年）是百年和平还是战乱不堪，进而揭示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基础与利益边界；其次，考察19世纪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而回应“双向运动”与“二元主义”的动力之争；再次，重思波兰尼和哈尔珀琳二人所界定的大转型的真实意涵，简单勾勒社会变迁洪流中波兰尼的生命历程及个体困扰；最后，反思概括哈尔珀琳对波兰尼批评的效力，分析作为历史事实的社会变迁与作为认知传统的社会思潮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揭示立足转型中国重访波兰尼的现实意义。

二、百年和平抑或冲突不断：19世纪欧洲的战与文明

（一）重新定义的19世纪：1815—1914

自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就加快了迈入资本主义文明的步伐。旨在消灭中世纪残余制度的大革命让整个世界措手不及（托克维尔，1992：64）。斯考切波（2015：3—4）指出，大革命不单让法国顷刻间变成了欧陆的征服性强国，这场社会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更是激发了各国人民寻求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想象力。基于此，托克维尔（1992：46）指出，这些理想信条既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更是大革命最重要的功绩。因为文明的连贯性和战争的延续性，一些历史学家将1789年作为起点来重新定义19世纪。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与《极端的年代：1914—1991》——分别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作为两端来定义“漫长的19世纪”（霍布斯鲍姆，2017a，2017b，2017c，2017d）。波兰尼在更早的时候就将1914年作为19世纪的终点，但他重新定义19世纪的起始点却选择了1815年。在他看来。这一年不单是新旧制度的决战之年，更是欧洲进入百年和平的起始之年。

1815 年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这一年的 2 月 26 日,拿破仑从地中海的厄尔巴岛逃出。他到达法国后一路演说,鼓吹自己能“给法国带来和平”,这让很多士兵和民众看到了法兰西帝国重生的希望,并迅速倒向拿破仑。3 月 20 日,拿破仑在前呼后拥下进入巴黎,不费一刀一枪成功复辟,开启了“百日王朝”。与此同时,俄、英、奥、普等欧洲封建君主国集结 70 多万兵力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6 月 18 日,滑铁卢战役的失败让拿破仑及其拥戴者的希望彻底破灭,反法联盟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拿破仑及其继任者是重建欧洲和平的“唯一障碍”。拿破仑再次被流放,只不过这次到了更远的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吊诡的是,在滑铁卢战役前 9 天,即 1815 年 6 月 9 日,维也纳会议就已经召开并签署了决议,企图重新分配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版图。^① 9 天之后,反法同盟在滑铁卢战场上的胜利才最终赋予了维也纳体系合法性。为了进一步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同年 9 月俄罗斯帝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联合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和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组成了维护君主政体、捍卫基督教尊严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神圣同盟强调要捍卫作为西方文明根基的耶稣之公正、慈爱与和平,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性革命(刘宗绪,1983;储昭根,2018),这为神圣同盟以和平的名义在 19 世纪前叶公开镇压欧洲各国内部的革命埋下了伏笔。

透过战争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窥见和平。近代以来欧洲一直征伐不断,17、18 世纪各有六七十年的战争,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从欧洲发端。但波兰尼(2007: 5)却发现,1815 至 1914 年的一百年间出现了“百年和平”——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外,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之间的战争总共只有 18 个月,惨烈的普法战争(1870—1871)也不足一年时间。然而,针对这同一段历史,哈尔珀琳(2009: 141)却有完全相反的判断,她指出在 1815 年拿破仑战争和 1914 年正式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并没有经历所谓“和平的世纪”,“在这个时期的欧洲内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俄国、丹麦、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塞尔维亚中的两国或多国之间发生了 14 场战争。英国、法国、俄国和奥地利在欧洲发动了 12 场反对外国人民的战争。在那个时期内,在欧洲之外,欧洲国家也卷入了 58 场战争。”由此可见,哈尔珀琳笔下的 19 世纪欧洲是战乱不断的。为什么针对同

^① 1814 年 4 月 4 日拿破仑在与反法同盟的第六次交锋中落败,他被迫退位并流放至地中海的厄尔巴岛。1814 年 9 月 18 日,俄、英、奥、普四个战胜大国号召其他国家一起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协商重新分配法兰西第一帝国战败后的欧洲政治版图。因为各国利益分歧很大,直到 1815 年初决议仍难以达成。

一历史时段哈尔珀琳与波兰尼却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呢？不同的战争叙事背后潜藏着怎样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分歧？

（二）19 世纪战争叙事背后的方法论意涵

哈尔珀琳与波兰尼关于 19 世纪欧洲社会秩序针锋相对的判断背后，隐含着关于“战争”概念界定的不同。波兰尼并不否认，19 世纪的欧洲存在频繁的地区冲突，但这些局部冲突最终都在和平利益的考量下、霸权的相互制衡中得到消解，世界性的战争得以避免。波兰尼（2007：5—6）指出，在 19 世纪上半叶，因为立宪主义遭到禁止，神圣同盟以和平的名义实施了各种压制，内战、革命和反革命此起彼伏，例如西班牙丹格林公爵（Duc d'Angouleme）率 10 万兵勇对卡迪兹城（Cadiz）的攻占，匈牙利皇帝在俄罗斯支持下对毛焦尔族（Magyar）的反革命镇压以及神圣同盟对日耳曼诸城、比利时、波兰、瑞士、丹麦和威尼斯等地的武装干涉等；到 19 世纪下半叶，国际金融组织和银行家们同样以和平的名义将宪法硬塞给了专制的君主，并不断变换各种意识形态以便继续维持和平。虽然 19 世纪冲突不断，但和平实用主义在多重制度维系下得以存留，和平利益构成避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现实关切。基于此，波兰尼（2007：226）一再重申，欧洲 19 世纪与之前几个世纪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完全没有爆发全面战争，而后者存在不定期的全面战争。

欧洲战争史的主流叙事是从嵌入性视角去考察具体的战争形式或技术变化是如何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相互形塑的（霍华德，1998；基根，2015）。19 世纪的战争史实似乎并不在研究战争的学者们的兴趣范围之内，或许 19 世纪本身就是被重新思考现代世界历史的学者所“遗忘的时期”（弗兰克，2019：1）。历史上 19 世纪的欧洲到底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已经无从考证，我们也只能从这些大历史的宏观叙述中通过一些零散的线索窥知一二。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2019：35）强调 19 世纪的欧洲对其他地区的军事干涉并不频繁，甚至对大多数地方毫无干涉，欧洲列强在欧洲之外的政治涉足和干预中，从未使用过主要军事力量。只是到了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军事干涉才更加频繁，规模也更加庞大，这是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应对 1873—1895 年经济危机而到处竞争的结果，它们竞相在自己的欧洲对手到达之前抢占立足点。波兰尼等学者强调的百年和平是以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为前提的。吉登斯（1998：269）也认为在整个 19 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之间相对稳定，各个大国之间会定期举行国际会议，裁决各种潜在的危险争端，但这并不表明

它们之间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就没有紧张和冲突。恰恰相反，国内绥靖政策的进程充斥着对现存秩序的挑战，而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发展的介入，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血腥掠夺。

对同一历史时期战争事件描述解释上的差异，还与作者的分析视角有关。正如米塞斯评论早期工厂制度的争议所言，诉诸历史事实并不能解决争论。因为对于事实的认定，两派人并不存在意见分歧，他们的对立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上，而这种解释必然是以自己选择的理论为指导的（哈耶克，2003：179）。波兰尼的分析思路是国际性的霸权均衡体系和金本位制这类外生性变量为欧洲国家提供了机会结构（布洛克、萨默斯，2007：79），继而对国内的社会行动产生影响。哈尔珀琳则秉持一种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聚焦社会冲突这种内生性变量对国家本质和行动的影响，进而揭示不同国家的行动策略和后果是如何形塑国际体系的。通过定义19世纪是冲突的而非和平的，哈尔珀琳重新寻找欧洲工业扩张的动力（哈尔珀琳，2009：336）。波兰尼的分析着眼于新兴资产阶级，而哈尔珀琳认为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变成统治阶级，她重视欧洲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不同阶级间社会冲突的作用。

综合以上讨论不难发现，百年和平与世纪战乱的不同判断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二者共同指向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换言之，哈尔珀琳与波兰尼对19世纪欧洲战争叙事上的差异，更多的不是历史事实本身的差异，而是关于历史事实解释的差异。战争叙事的差异与叙述主体的立场紧密相关。例如，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几乎席卷了每一个现代阿拉伯国家，但在大部分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中，那场战争是即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与鲁莽的土耳其青年党镇压阿拉伯人民的历史。由此，在阿拉伯人的战争叙事中，一战是一场“他人的战争”。对阿拉伯人而言，一战中只有烈士，没有英雄。虽然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更加衰落了，但在土耳其的加里波利半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随处可见，针对战争的追思持续不绝（罗根，2017：7）。这种战争叙事的分歧涉及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通常，历史学家主要关心过去的历史事实，而社会学家则更关心当下的社会事实。我们所在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由许多事实拼接而成的，整个社会的存在与运作都遵循我们对过去历史事实和当前社会事实的理解。并非过去的历史事实本身锻造了“现在”，而是历史事实造成部分人掌握社会权力和历史记忆，历史记忆让人们生活于“现在”的社会现实之中，或者说“历史”造成了当下的社会情境

(王明珂, 2016: 5—17)。相较于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战争, 和平似乎更是历史的微末或细事, 前者有明确的时间节点, 后者则容易演化为模糊的历史记忆。这也是我们重访 19 世纪“大转型”的意义所在。

三、双向运动抑或二元主义：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

在解释 19 世纪欧洲工业资本主义体系时, 波兰尼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边界, 哈尔珀琳则关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边界, 这两种视角都发展为理解 19 世纪这一“时代过程”的重要学术传统。在波兰尼的理论图示中, 19 世纪的社会历史是双重运动的结果: 市场体系在真实商品方面扩张的同时, 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限制。具体而言, 一方面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无数商品卷入市场浪潮之中, 世界商品市场、世界资本市场以及世界货币市场在国际金本位的庇护下为市场机制的拓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社会奋起保护自身, 各种社会政策和防范措施编织的网络配合强有力的制度力图抑制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市场化进程。自由市场运动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双向互动刻画出了 19 世纪文明的底色 (波兰尼, 2007: 65—66)。然而, 这种“双向运动”的见解在哈尔珀琳看来是具有误导性的, 因为并不是社会中所有的集团都受到市场扩张的威胁, 也不是所有的集团都需要从中得到保护。波兰尼之所以没有抓住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二元主义本质, 是因为他忽视了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带来的新型阶级结构的变化 (哈尔珀琳, 2009: 16)。在此基础上, 哈尔珀琳强调将阶级分析带入大规模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来。在这里, 哈尔珀琳是在代替马克思与波兰尼论战。

为了揭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 哈尔珀琳重新考察了 19 世纪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历史进程, 她认为阶级力量平衡的改变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建构。尽管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 但传统的阶层结构依然保留, 土地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而限制国内居民的消费。民族国家通过增加国内绝对剩余价值、限制国内市场和拓展国外市场, 使工业化生产的扩张成为可能, 少数跨国精英得以对工业化扩张所产生的利润进行垄断 (Halperin, 2018)。这种基于外部扩张而非国内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 限制了工业化在民族国家内跨地域和跨部门的传播, 欧洲工业扩张缺乏内部的结构整合。因此,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

有形成自由主义的、竞争性的精神气质，反而被塑造成垄断的、乡村的、前工业的、封建的和专制的权力结构。这些结构确保了支配阶级不仅能够延续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传统基础，还能通过垄断工业扩张的利润将其他阶级和团体从政治和经济生活之中排除出去（哈尔珀琳，2009：16）。二战之后，生产制度转向以改善工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加之既往的社会权力结构及其所赖以生存的阶级关系、土地关系和收入结构相继破裂，这种阶级力量的变迁与重新制衡才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与繁荣。

虽然战争会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和无限痛苦，但围绕战争进行的动员以及战争过程本身往往会带来非预期性的后果，也有可能助推社会的发展（赵鼎新，2015：178）。哈尔珀琳将战争作为考察欧洲历史的出发点，是因为劳工阶级的地位是在战争中提升的，两次世界大战增加了工人阶级组织化的力量以及社会对工人阶级的需要，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极端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实现更替，社会的自我保护在一次次战争中成为可能。至此，我们可以明了的是，阶级结构既是透视工业资本主义二元发展动力的基本视点，也是理解双重运动、穿透历史与当下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然而，波兰尼真的忽视了阶级分析吗？或者说波兰尼的阶级概念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有哪些不同呢？

波兰尼（2007：114）指出土地所有者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提供的服务以及三者之间的频繁互动构成整个19世纪的社会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对阶级的强调是重要的”。只不过，波兰尼反对把阶级定义为“经济利益的集合体”，他强调阶级由社会构成，个人并非是由私利动员起来的。虽然波兰尼不断使用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等概念，但他反对将阶级视为历史客体。换言之，他反对把阶级视为社会结构的搬运工。在这里，波兰尼实际上把阶级视为文化的，而非经济的。在波兰尼看来，文化上的破坏比经济上的剥削更可怕。由此可见，虽然阶级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用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很难理解（布洛克、萨默斯，2007：70—72）。基于此波兰尼指出，经济取向的阶级利益对社会的长期运动所能提供的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

工人阶级虽然是社会保护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并不是唯一的，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参与了这项事业，即使是作为资产阶级的银行家也会在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时主张加强中央银行，来减轻国内信用供给受到的全球市场压力，抵制市场的自发调节带来的不确定性，参与保护社会的运动。波兰尼（2007：130）承认阶级利益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然而社会变迁本身是外因决定的，仅在涉及变迁的机制时

才依赖于内在力量。因此，波兰尼（2007：130）反复强调我们在解释历史时不要过分依赖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他认为这种研究路径隐含的前提是那些阶级是确定不变的，在社会的结构已经明确的情况下，阶级理论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假如社会结构本身经历变迁的话，阶级的界限本身也是变动的。在波兰尼那里，社会，而不是阶级，才是超验的历史范畴，他用从“自在的社会”到“自为的社会”的过程代替了经典的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过程。波兰尼关注的是一种联合了所有阶级的共同利益或者说偶合的（coincident）利益，而哈尔珀琳的观点则是葛兰西所说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协调（coordination）（布洛维，2007：250）。

以整体社会为单位和以个体阶级为单位体现了方法论策略的不同，它们分别对应着解释型历史社会学和阐释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进路（郭台辉，2019）。波兰尼以整体社会为分析单位，揭示了历史长程运动的规律，即市场的自由扩张必然伴随着社会的自我保护，这一双向运动不仅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生动写照，对两个世纪以后的逆全球化运动以及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也有很好的解释力。然而，遗憾的是，波兰尼没有清楚说明市场破坏到什么程度会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以及社会的自我保护是何以可能的，他强调的经济重新嵌入社会也并没有说清楚何以重新嵌入。社会反向的自我保护发生之后，下一次的市場扩张会发生吗？如何发生？这也正是许多学者对波兰尼理论的诟病所在。特别是在二战结束仅三十年后，当资本主义体系的滞胀危机催生了新自由主义市場浪潮之后，很多人重访波兰尼，一方面批评他没能预见到市場自由主义的快速重生，另一方面拓展波兰尼的理论进路，思考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有效的社会保护。显然，我们不能把波兰尼的双重运动当作一条铁律，而应该考察其运作的条件，因为市場并非一定能产生一个生机勃勃的能动社会（布洛维，2007：276）。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回到波兰尼，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思考“漫长的19世纪”文明转型轨迹以及“短暂的20世纪”的战争冲突和秩序重建进路。

四、再探19世纪欧洲文明的变迁：立足当下重访波兰尼

（一）大转型涵义之争

两次世界大战将20世纪文明的历史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人们已经习惯将

1914—1945 年视为战乱冲突的时代。在欧洲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战争之后，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大部分国家卷入了灾难的深渊（曼，2015：176）。波兰尼（2017：248—250）强调，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符合 19 世纪的特征，即两大强国为首的联盟之间的战争和对峙。这场战争比此前的人类冲突都要可怕，它不单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卷入相互厮杀的泥潭，还标志着 19 世纪欧洲文明的消解。我们今天重新思考 19 世纪欧洲文明的历史，意在探究其与当前变迁趋势的相关性（哈尔珀琳，2009：英文版前言）。在历史社会学的视域下，无论是某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体系，都不存在一般性的社会变迁，更确切地说只是存在着一种“时代过程”，一如国家形成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考察这些“时代过程”之间的关系（斯考切波，2007：19；Tilly，1984）。1815—1914 年作为一个独特的时代过程，为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及崩溃提供了重要的时间轴，而此后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规避大规模战争与延续文明的制度基础。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由一战开启的欧洲社会转型。二战对社会的固有秩序产生了剧烈冲击，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变革的抵制力量，并重塑了欧洲的阶级结构。二战结束后，欧洲开启了一个相对和平以及政治稳定的时代。波兰尼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对人类战争行为与文明形态进行反思。他在努力探究世界性战争灾难发生根源的同时，还试图提供一个重归和平秩序的方案。在战后世界秩序重建这一问题上，波兰尼展示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图示，在他看来道德失序既是自我调节市场运动的后果，也是世界性战争爆发的原因。透过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兴起、经济危机等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波兰尼提出前工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以及自由主义市场浪潮的冲击是造成 1929 年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而大萧条及其造成的整体性社会危机是促进浪漫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布洛克，2007：导言）。换言之，前工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转变而发生的自我调节性市场体系的兴起过程构成“第一次大转型”，而自我调节性市场泛滥以及治愈市场失灵的法西斯主义兴起引发的 19 世纪文明的消亡过程乃是“第二次大转型”，而且第一次大转型构成了第二次大转型的原因。

与波兰尼相似，哈尔珀琳（2009：英文版前言）同样强调存在两次大转型：第一次是对经济生活社区控制的连根拔起，即经济从社会中脱嵌而出的过程；第二次是对经济生活社区控制的复原，即经济重新嵌入社会之中的过程。哈尔珀琳

(2009: 英文版前言) 认为波兰尼不仅忽略了对导致自我调节市场兴起的“第一次转型”的详细考察, 还未能预见经济重新嵌入社会这第二次大转型的具体过程。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未能关注到社会结构和阶级冲突才是塑造工业革命后欧洲社会整体发展与转型的关键变量。哈尔珀琳进一步强调, 这种疏忽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冷战意识形态。因此, 对波兰尼和哈尔珀琳学术争论的评判必须首先回到历史本身。

不同于“百年和平”和“战争世纪”的整体性判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 19 世纪的欧洲分成“欧洲协调”与“帝国争霸”两个时期, 他们既看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因军事平衡、共同价值观和共生性的经济结构而协调, 又发现这一国际体系的非正义性和两大强国之间的战略冲突必然导致协调机制的崩溃(兰洋, 2021)。因此, 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是和平与炮火交替、协调与争霸并存的复合型文明形态。1848 年 2 月, 马克思、恩格斯(2012: 405) 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这个蕴藏着无穷社会生产力的世纪也催生出以往时代不具有的新问题。

(二) 社会变迁洪流中的波兰尼

19 世纪文明之所以独特, 是因为它是以一套新的制度设置为支撑的。19 世纪欧洲社会内部的四种制度——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性市场制和自由主义国家制的相互作用——形塑了西方文明的特有轮廓(波兰尼, 2007: 3—4)。势力均衡体系使欧洲各国相互掣肘, 它以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定为组织基础。当欧洲协约只是间或性地行使职能时, 国际金融便作为最富弹性的永久性机构发挥作用。国际金融这个独特机构具有国际性的地位, 它不受任何一个政府独立管辖, 其根基深植于追逐商业利益的私人领域(波兰尼, 2007: 10)。商业和金融的确是诱发许多殖民地战争的原因, 但长期战争会干扰到经济稳定, 出于此种考量, 全面战争得以避免。自我调节市场是国际金本位制建立的源泉, 也是自由主义国家确立的基础。19 世纪的欧洲社会是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两根支柱之上的, 但其经济和政治领域相互分离。除了 19 世纪社会的有限经验之外, 过去所有人类社会的制度都保持着一种“社会统一性”。如果一个社会在其自身轨道内包含一个独立的、自我调节的、自治的经济领域, 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乌托邦(波兰尼, 2017: 254)。

放弃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我们就得直面社会现实（波兰尼，2007：219）。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王朝更迭、帝国兴衰等大事件来看待历史时间，这些事件之所以构成历史时间的参照是因为它们改变了社会的政治状态，背后隐含的假定是历史时间由政治决定（奇洛特，2007：24）。历史是激发各种未来观点的竞技场，后世对历史的书写和阅读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党派性事务（哈尔珀琳，2009：英文版前言）。波兰尼终生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其理论与各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都有明显区别。波兰尼（2017：169）强调，19世纪以前经济是嵌入社会中的，19世纪之后经济才脱嵌出来成为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波兰尼不是真正忽略了阶级分析，而是反对经济决定论的阶级分析范式。

在阶级定义上波兰尼旗帜鲜明地反对绝对的经济决定论，他强调阶级的形成受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现象。导致退化和沦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波兰尼，2007：165）。塑造经济制度的影响因素中包含非经济因素，因而应该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市场之所以能自律运转，是因为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土地进入市场系统，而在19世纪以前没有哪个社会允许自己的劳动力和土地的命运由供需价格机制来控制。一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了或者合作、或者竞争的生活态度，对于技术的使用采用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态度，文化模式是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波兰尼，2017：49）。这与汤普森的观点相似，汤氏强调工人阶级并不是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阶级是受社会与文化影响的，“社会经历”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非经济因素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汤普森，2013：11）。

波兰尼秉持的“文化阶级论”与他个人的生命轨迹以及社会遭际也是息息相关的。在19世纪社会变迁的洪流中，作为思想家的波兰尼命运多舛，他一生横越五个国家，用三种语言写作（布洛克、萨默斯，2007：51）。1943年初，当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曙光传遍世界之时，波兰尼的巨著《大转型》正处于收尾阶段。为了能尽快从美国前往英格兰参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讨论，他不得不把《大转型》一书的结尾两章匆忙了事，甚至要请同事从他的笔记中辨识其本意来完成书稿的编辑。当然，波兰尼试图参与战后秩序重建的心情也表现在这本著作的最后章节中：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矫正市场的不确定性，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将不再成为商品（波兰尼-莱维特，2017：意大利文版序；波兰尼，2007：200—220；戴尔，2017：330—331）。显然，波兰尼过于乐观了，当1973年资本主义出现滞胀危机时，自由

主义随之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波兰尼对 19 世纪历史和市场自由主义的分析都再次被激活。

19 世纪文明并非毁于野蛮人的进攻，也不是源于法西斯主义的侵蚀，更不是生产过程或消费不足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造成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之间的持久张力是 19 世纪文明崩溃的根源，而外在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灭亡（波兰尼，2007：211）。由于 19 世纪欧洲文明的转变可以类比今日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直接针对当下议题发问。如果波兰尼面对当下的社会来写作，会找到很多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论点，以东亚发展模式为例，国家（政府）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承认社会团结的价值，并努力保护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斯蒂格利茨，2007：前言）。在布洛赫看来，历史所承载的关于过去的知识有助于理解当下的社会情形，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祛魅”——祛除读者关于过去的愚昧想法（奇洛特，2007：46）。波兰尼对 19 世纪自由市场体系脆弱性、矛盾性的分析为我们理解新时期的市场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这也是我们立足转型中国重访波兰尼的现实意义所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哈尔珀琳对波兰尼两个基本命题的批评入手，以 19 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为依凭重访“大转型”，借助对历史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的运用，我们可以更加明确以下三点。

其一，关于 1815—1914 年欧洲是百年和平还是战乱不断，哈尔珀琳和波兰尼的分歧体现在对战争概念界定的不同，二人关于 19 世纪欧洲战争叙事上的差异，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的差异，而主要是关于历史事实解释上的差异。波兰尼所说的百年和平是以欧洲区域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为事实依据的，哈尔珀琳揭示的世纪战乱则是以欧洲区域内和区域外的暴动、叛乱、革命、起义、暴力罢工、骚乱、示威游行以及公开宣战的战争为统计口径的。战争与和平的争论虽然是哈尔珀琳引入问题的始点，但并不是焦点。二人主要分歧是关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认识差异。

其二，19 世纪欧洲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市场—社会”的双向运动，还是“对内剥削—对外扩张”的二元主义？动力之争背后潜藏的是研究者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不同分析进路。波兰尼发现了“整体性的社会”与“没有灵魂的市场”之间的相互对抗与妥协，以及二者相互制衡的钟摆运动；哈尔珀琳则从阶级分析的视角看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内部的剥削结构和外部的扩张倾向，揭示了阶级力量变化对社会变迁和秩序重塑的影响。波兰尼并没有忽略阶级，只不过他把阶级视为文化的，而非经济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分野为标识的“经济阶级论”不同。但波兰尼对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认识过于乐观，没能揭示出双重运动得以发生的具体条件和微观机制，同时他也低估了社会民主与资本主义机器契合的可能性。

其三，大转型的真实意涵及其现实意义。在波兰尼这里，随着前工业文明向工业资本主义文明转变，由此发生的自我调节性市场体系兴起过程构成“第一次大转型”的内涵；自由市场浪潮泛滥以及作为矫正自由市场缺失而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所引发的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过程是“第二次大转型”。在波兰尼看来，两次大转型具有“前因”和“后果”的逻辑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 19 世纪文明崩溃的根源，只是加速了它的进程。哈尔珀琳同样关注两次大转型，并强调波兰尼忽略了对导致自我调节市场兴起的“第一次转型”的详细考察，也未能预见经济重新嵌入社会这第二次大转型的具体过程。但波兰尼开启的关于市场体系脆弱性、矛盾性的刻画以及对大转型进路的分析却随着每一次全球性的市场波动而常读常新。

我们重新思考 19 世纪欧洲文明兴起与消解的历史过程意在探求这种历史转型与当前变迁的相关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当一些民族国家沦为全球资本的地方性警察之时，当金融资本作为主导逻辑驱逐利润较低的工业制造并侵入日常生活之时，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让市场停摆、全球生产链条中断之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波兰尼关于自我调节性市场内在矛盾的分析。重访波兰尼，不单要从他关于市场变迁的宏观性公共议题中获得启迪，还要从他回归道德和人性以化解个体性困扰的方案中获得解放。波兰尼经由战争透视文明与和平的研究进路似乎给人类指出了一条明路：战后秩序重建以及回归社会常态的人性基础。在 21 世纪的今天，当俄乌冲突的升级让战争的阴霾再次笼罩欧洲乃至世界时，我们再次渴望以道德为基础的和平。当网络社会经由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云图等手段实现人类全景式的无缝连接时，社会成员个体却愈发原子化，他们也更渴望人与人之间基于人性基础的社会

团结。因为只有道德和人性才能将人类引向自由，让人类走向文明之路。

1964年4月，在去世前几天，卡尔·波兰尼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封建国家的关键是特权；资产阶级国家的关键是财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是人民，是享受文化共同体的集体存在。我自己还从来没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波兰尼－莱维特，2017：意大利文版序）在19世纪、20世纪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历史洪流中，波兰尼个人的思想进程因其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而几经转变，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直到他带着遗憾离开他所思考的世界。但他开启的理论图示和智慧思想却并没有随之消散，每一次全球性的市场波动都会引发人们对波兰尼的重新关注。

参考文献：

- 波兰尼，卡尔，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17，《新西方论》，潘一禾、刘岩译，深圳：海天出版社。
- 波兰尼－莱维特，卡莉，2017，《意大利文版序》，卡尔·波兰尼著《新西方论》，潘一禾、刘岩译，深圳：海天出版社。
- 布洛克，弗雷德、玛格丽特·R·萨默斯，2007，《超越经济主义的谬误：卡尔·波兰尼的整体性社会科学》，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布洛维，麦克，2007，《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储昭根，2018，《观念竞合与国际体系的变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戴尔，加雷斯，2017，《卡尔·波兰尼传》，张慧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弗兰克，贡德，2019，《19世纪大转型》，吴延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郭台辉，2019，《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分化来源》，《学术月刊》第12期。
- 哈尔珀琳，桑德拉，2009，《现代欧洲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唐凤皇、武小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哈耶克，F. A.，2003，《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霍布斯鲍姆，艾瑞克，2017a，《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2017b，《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2017c，《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2017d，《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霍华德，迈克尔，1998，《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基根，约翰，2015，《战争史》，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吉登斯，安东尼，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兰洋，202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十九世纪欧洲国家关系的论述及其当代启示》，《哲学研究》第6期。

刘宗绪，1983，《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和神圣同盟的建立》，《世界历史》第6期。

罗根，尤金，2017，《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王阳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曼，迈克尔，2015，《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郭台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奇洛特，丹尼尔，2007，《马克布洛赫的社会和历史图景》，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斯蒂格利茨，约瑟夫，2007，《前言》，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斯考切波，西达，2007，《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汤普森，E. P.，201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托克维尔，1992，《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明珂，2016，《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鼎新，2015，《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Halperin, S. 2018, “Polanyi’s Two Transformations Revisited: A ‘Bottom up’ Perspective.” *Globalizations* 15 (7).

Szelenyi, I. & P. Mihályi 2020, “Karl Polanyi: A Theorist of Mixed Economies.” *Theory and Society* 50 (3).

Tilly, C. 1984,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郭云蔚